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集刊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CNKI中国知网入选期刊

主编 王 杰

马克思主义美学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第15卷 | 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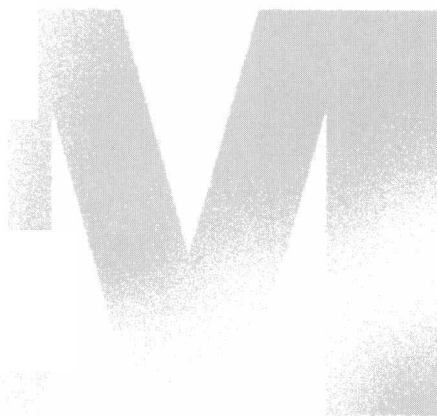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名誉主编	刘纲纪
主 编	王 杰
副 主 编	夏锦乾
编辑部主任	施立峻
编辑部副主任	张蕴艳
编 辑	尹庆红
	邵瑜莲
	于 琦
英文编辑	索宇环

马克思主义美学 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Aesthetics

第15卷 | 第1期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15卷. 第1期/王杰主编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17-1469-5

I. ①马…

II. ①王…

III. ①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集

IV. ①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79378号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第15卷. 第1期

出 版 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薛晓源

责任编辑 王忠波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 (010)52612345(总编室) (010)52612339(编辑室)
(010)66161011(团购部) (010)52612332(网络销售)
(010)66130345(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home.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 430千字

印 张 21.5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65.00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卷首语

1

卷首语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到今年整整走过了十五个春秋。积十五年的感想、体会和经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有了更多、更宽广的理解。从研究的角度看，当今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既是一种美学原理、美学思潮，也是一个美学学派和一门美学学科；既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一部分，也属于美学的一部分；既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又与东方文化密切相联，是超乎东西方文化的人类共同的财富。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它涵盖的面是非常宽的，无论原理、思潮的研究，还是学派和学科的研究，甚或对它们作综合和交叉的研究，都在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十五年来，我们正是秉着这一“研究”的宗旨，力图全方位地反映、展现这一领域的前沿成果，推进这一领域内外的相互交流。目前已有的栏目，如“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中英审美现代性差异”、“审美人类学”、“学术访谈及专论”等等，可以说都是这一宗旨的体现。本期我们又推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研究”新栏目，相信它会引起读者们的关注，因为它是把我们自身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识、接受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进而加深和拓宽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认识。

在本期“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研究”栏目中，我们荣幸地推出本刊的特约文章，著名文艺批评家张炯先生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它以三个

三十年的崭新思路对“五四”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实践历程作了清晰的梳理，以重新认识文艺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与现实生活、与人民大众、与政治、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关系，以及与现代社会经济等等的关系，该文高度总结了文艺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艺规律，正如文中所说，“这些理论认识虽然难以涵盖当代文艺理论的全部，却相当程度上充实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体系，并为引导我国文艺迈向未来的光明前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是张炯先生近年来的一篇精心力作，笔力雄健，高屋建瓴，充满着反思意识，是老一辈文艺批评家在新时代条件下对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最新思维成果。本栏目的另外两篇：朱仁金的《前期朱光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刘中望的《政治与学术的复调话语——论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关系维度》，它们的具体研究对象虽各有别，但寻求历史真实语境的理性眼光与执著精神却是共同的，这或许正是两文除了具体论述价值而外给予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本期“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栏目的一组文章也颇有看头。作者是一群中青年学者，思想敏锐，视野开阔，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领域的勃勃生机。张红军解读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身体观，刘晓燕把阿多诺美学的原点确定为“摹仿”，周键研究了尼采作为哲学范畴的悲剧概念，罗如春讨论了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对民族叙事的解构，范永康则研究了后精神分析文本的泛政治化现象，舒也、李蕊对价值论美学作了全面的思考，邵瑜莲、王杰则全面述评了中国学者近年来对于生态危机的根源的反思成果，并指出，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是人及其所制定的制度。尽管视野是多维的，但他们又共同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从经典性走向当代性的某种可喜的动向。

与国际一流学者的密切联系与交往，是本刊长期以来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也成为本刊的特色之一。许多国际知名学者不但受聘为本刊的编委，而且还定期向本刊提供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把本刊看作他们与中国学者作学术交流的平台和桥梁。本期在“域外来稿”栏推出的《作为展示体系的博物馆》一文，就是本刊编委之一托尼·本尼特的重要作品，选自他的代表作《博物馆的诞生》。此书被西方学术界作为研究博物馆学的必读书。托尼·本尼特在本文中深刻地指出了博物馆的象征意义以及它与政治权力的关系。英国学者尼尔·拉扎勒斯和拉什米·瓦玛合写的《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研究》也值得读者仔细一读。文章指出后殖民研究因忽视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而给学科发展带来严重损失，并预示，当前的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将为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研究的关系开辟新的空间。美国学者马克·希尔伯曼在《再现的政治：布莱希特与媒介》中试图以布莱希特的再现媒介理论和他对电视文化的杰出预见来回应当前电子传媒时代的问题，相信他的这一思路会引起读者的兴趣。

“学术访谈”由于访谈人与知名学者面对面的交流，新见迭出，信息量大，

加上清新自然的口语风格，一向为读者所关注。本期共推出三篇。《文化研究：回到美的现象》（*Cultural Studies: Return to Beauty*）一文，是本刊两位编辑利用今年“中英双边论坛”在英国举行的机会，对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珍妮特·伍尔芙教授的访谈。文中珍妮特·伍尔芙教授畅谈了文化研究中的批判理论与女性主义美学价值问题，及如何展开审美分析的问题。《马克思：民族音乐学与声像档案》（*Marx, Ethnomusicology and Audiovisual Archives*）一文，则是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著名民族音乐学教授安东尼·西格的访谈。他以独特的视角提醒我们重新认识“声像档案”在人类学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多元比较与回到历史语境：学科史研究的新方法》是对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文学系张英进教授的访谈，张教授从“比较的电影史”和“比较的文学史”方法的讨论，得出关于一般学科史方法的精彩见解，值得向读者推荐。

本期“审美人类学”栏三篇文章均来自国外学者。托尼·傅雷利斯《审美人类学的问题阙》为我们带来的是学科的问题意识，不管遭遇何种境况，人仍然是审美人类学关注的中心。约瑟夫·马里的《神话、历史与神话历史》是一篇高度凝练的神话历史史，它彰显了当今西方史学的某种新动向。扎拉·巴拉尼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种族和族群》则将我们带到了远古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中去把握他们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种族和族群观念。

时间真快，到今年6月，著名美学家周来祥先生离开我们一周年了。在本期“津辉讲坛及其他”栏目，我们编发了一个纪念专辑，其中有周来祥先生夫人戴磊教授的追思文章；首都师范大学邹华教授则从美学方法论的角度，追念先生的辩证思维方法对他学术生涯的巨大影响；贵阳学院刘继平教授一文对和谐论美学的形成发展和对中国美学的贡献作了扼要而清晰的评述。文章最后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共同感受：学习先生的美学思想，发展先生的美学思想，就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我们愿与大家共勉。

今年4月12日至14日，“中英马克思主义美学论坛”第二届年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隆重举行，会议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本刊主编王杰，编辑部成员施立峻、张蕴艳、尹庆红出席会议。会议部分论文将在本刊下期刊发。论坛组委会决定，第三届年会明年4月在上海举办，主题为“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我们期待更多的学者加入我们的论坛，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编辑部

2012年5月10日

目 录

卷首语	1	
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史研究		
张 炯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	1	1
朱仁金		
前期朱光潜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	27	／
刘中望		
政治与学术的复调话语——论瞿秋白与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关系维度	40	目
多维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张红军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身体美学解读	51	
刘晓燕		
摹仿：阿多诺美学的原点——兼论本雅明的摹仿概念	61	
周 键		
“他者”语境下的尼采悲剧观——以《悲剧的诞生》为例	69	
罗如春		
作为叙事的民族——霍米·巴巴对民族认同的后殖民解构	79	录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

范永康

从心理分析走向政治批评——后精神分析文论的泛政治化现象研究 88

舒也、李蕊

价值论美学论纲 97

邵瑜莲、王 杰

生态危机的根源探析述评 117

域外来稿

[澳大利亚] 托尼·本尼特

作为展示体系的博物馆 (薛军伟译) 135

[英] 尼尔·拉扎勒斯、拉什米·瓦玛

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研究 (丁兆国译) 156

[美] 马克·希尔伯曼

再现的政治：布莱希特与媒介 (陈后亮译) 173

学术访谈

Janet Wolff、Shi Lijun、Zhang Yunyan

Cultural Studies: Return to Beauty—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Janet Wolff 187

Anthony Seeger、Fan Xiujuan

Marx, Ethnomusicology and Audiovisual Archiv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nthony Seeger 198

张英进、谢卓婷、盛丹、王真

多元比较与“回到历史语境”：学科史研究的新方法——
张英进教授访谈 205

审美人类学研究

[美] 托尼·傅雷利斯

审美人类学的问题阈 (张良丛、杨雪译 张良丛校) 218

[以色列] 约瑟夫·马里

神话、历史与神话历史 (胡建升、陈心湛译) 232

[美] 扎拉·巴拉尼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种族与族群 (唐启翠译) 261

“津辉讲坛”及其他

周来祥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

戴 磊

周来祥：一个为美学事业燃烧了生命的人 273

邹 华

辩证思维与美学研究——周来祥美学方法论对我的影响 278

刘继平

周来祥与和谐自由论美学的形成与发展 288

书评与综述

李艳丰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当代发展与理论建构——
读王杰教授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295

迟宝东

文化研究与大学文学教育——评陆扬主编的《文化研究导论》 302

邵丽平

“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学术研讨会暨《美学与马克思主义》、
《跨文化齐泽克读本》新书发布会综述 306

英文目录

310

英文摘要

313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投稿须知

324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投稿格式

326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

■ 张 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

【内容摘要】本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新文艺发展的关系，从回顾“五四”后三个三十年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实践所导致的历史和文艺的变化，以及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文艺理论与文艺实践的互动和有关争论，总结了九十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所达到的关于文艺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认识。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文艺规律

文学艺术不仅满足人民的审美需求，还能够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和历史，优化自己的思想情感，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它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传播民族文化的有力传媒。在历史进入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中，它已成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和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艺如何发展绝非小问题，

* 张炯，1933年生，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兼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理论批评委员会主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2

而是关系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大问题。

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黄遵宪、夏曾佑等发动“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就源于认识到文学艺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巨大意义。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便指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当时的维新派堪称新文艺的先驱。但真正的新文艺则崛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中。

中国新文艺迄今已有九十多年的历史。它的诞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差不多同时。梁启超、孙中山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到了1917年俄国发生革命，工农掌握了政权，震动了全世界，这才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李大钊不但在《新青年》上连续发文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还与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则是新文化运动的最激进的旗手。他们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中的先进分子积极筹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并成为党的初期主要领导人。这样，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艺的发展，各种思潮和文艺现象纷至沓来，都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需要面对的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文化新文艺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又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文化新文艺的实践分不开。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指导相关实践的同时，必然要从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去升华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思想。马克思主义不仅为中国开辟了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胜利道路，也为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的指导，并赋予新文艺以新的思想艺术境界，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

从1921年至今，中国革命的发展差不多经历了三个三十年。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逐步形成毛泽东思想，实现民主革命的胜利；中间的三十年在毛泽东思想及其后来左倾路线的引导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探索，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工业化基础，也产生过严重的曲折；后三十年则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实行改革开放，进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在国家实力的各个方面均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新文艺在上述三个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历史风貌和发展状态。中国共产党的文艺理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下，也大体经历了上述三个历史阶段，并在对文艺发展规律不断深化认识的基础上，开拓文艺繁荣发展的广阔道路。

二

第一个三十年中，中国共产党于深化文艺规律认识的过程中，使文艺为新

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做出有力的贡献，并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

文化和文艺的领导权问题，文艺与革命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就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要实现领导权，并使文艺为革命事业服务，必然要提出相应的文艺理论，并团结和建构强有力的文艺队伍，展示文艺创作的新成绩。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是否应该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问题，曾经有过争论。随着革命的进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主张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的意见，在大革命失败后便为全党所接受。而实际上，新文化新文艺一诞生，信奉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就在其中起着重要的领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新文艺已如火如荼而且趋向复杂多元。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各种思潮相互激荡。文艺上唯美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等艺术主张纷纷登台。西方哲人从柏拉图到尼采、马克思、弗洛伊德、杜威的学说，都冲击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当时信奉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和信奉西方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思想摇摆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在推进新文艺中产生自己的影响。正在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的共产党人当然也要争夺新文化新文艺的领导权。为实现这种领导权，当时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来阐明新文艺应朝何种历史方向发展，文艺到底为什么人，它与革命、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等重大理论问题。

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陈独秀还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时，早就在《文学革命论》中提出“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生活文学。”对于陈独秀的“国民文学”思想，后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表述为“平民文艺”。前此中国文学的主流多为贵族和士大夫的文学。因此，“国民文学”和“平民文艺”主张的提出，不能不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邓中夏在1923年更提出三条主张：即诗歌必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他说：“如果你是坐在深阁安乐椅上做革命的诗歌，无论你的作品、辞藻是如何华美，意思是如何正确，句调是如何铿锵，人家知道你是一个空喊革命而不去实行的人，那就对于你的作品也不受什么深刻地感动了。”^①这实际上就提出了文艺必须反映现实并与革命紧密联系的理论主张。早期就加入共产党的茅盾，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和主将。他在《文学与人生》和《什么是文学——我对于现代文坛

^① 邓中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原载1923年12月22日《中国青年》第10期。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4

的感想》两文中不但提倡“为人生的文学”，而且具体讲到因人种、环境、时代与作家人格的不同，文学所写人生也有所差异。他批判传统的“文以载道”说和“游戏说”，批判“名士派”和“颓废派”的文学。他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出发，明确提出，“商人工人都可以做文学家”，“革命的人，一定做革命的文学”。他还明确地说：“我们决然反对那些全然脱离人生的而且滥调的中国式唯美的文学作品。我们相信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文学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①因创作《女神》而盛誉诗坛的郭沫若，以提倡自我表现和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开始，随着中国大革命的发展，他不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急剧地转为革命文学的激进宣传者。在《革命与文学》一文中，也明确认为当今存在“革命文学与反革命文学”。他以欧洲新兴的社会主义文艺为鉴，更进一步号召作家“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并说：“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他不仅提到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而且明确地提出了文艺必须深入工农兵生活的口号。

文艺必须面向平民、面向现实、面向革命，这就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回答。它实际指明文艺发展的新的历史方向。这对当时新旧文艺并陈的文坛，无异石破天惊，发聋振聩，乃至被视为过激的“异端”。自然，这种回答是从马克思主义既要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又要对现实社会做阶级分析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出发的。前此，从马克思到列宁在这些问题上都已有基本论述，虽然他们有关文艺问题的言论，当时并未都翻译到我国来。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民主革命浪潮高涨的年代。鉴于代表军阀和洋奴买办势力的北洋政府的反动嘴脸日益暴露，身居南方的孙中山在李大钊等的协助下毅然实行联俄、联共、联合工农的政策，实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第一次合作，酝酿北伐的大革命。但1925年孙中山的去世和国民党右派的后来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激起共产党人发动秋收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了革命与反革命尖锐斗争的十年内战时期。系列的革命浪潮自然促进了革命文学的兴起。在我国新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在文艺理论重大问题上所做的阐述，无疑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当时的中国文坛上，革命文学如异军突起，涌现了大批的作品。革命文学的积极提倡者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短裤党》、《咆哮了的土地》便是激励许多青年走向革命的著名小说。丁玲从写《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到转向写《韦护》和《一九三〇年春上海》等革命倾向的作品，也显然受到革命文学主张的影响。殷夫（白莽）等人的诗歌，柔石、胡也频等人的小说，都为初期

^① 茅盾：《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原载1923年12月31日《文学周报》103期。

革命文学增添了耀目的亮色。

革命文学倡导过程中,发生了后期“创造社”和新成立的由共产党员成仿吾、钱杏邨、李初梨、冯乃超等组成的“太阳社”同人与鲁迅、茅盾的论争。它反映了革命文学发动者营垒中的“左派幼稚病”思潮和宗派主义倾向。而这场论争却促使鲁迅认真阅读和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使他更坚定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上来。鲁迅和茅盾都是新文学的奠基者。鲁迅以《呐喊》和《彷徨》开拓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而茅盾先以现实主义理论,后又以《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为大革命留下现实主义的写照。在1928年左右围绕革命文学的论争中,鲁迅在《文艺与革命》、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等文中实际还提出了革命文学发展必须很好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正确认识文艺的特性与本质,避免“标语口号”式的创作问题,革命文学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语言的大众化和欧化问题等。但这些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则是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以后。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无疑标志着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走上新的发展阶段。这个联盟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的主导下,联合鲁迅等党外作家成立的。左联在自己的纲领中宣布,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理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还指出,“我们的理论要指出运动之正确的方向,并使之发展。常常提出中心的问题而加以解决,加紧具体的作品批评,同时不要忘记学术的研究,加强对过去艺术的批判工作,介绍国际无产阶级艺术的成果,而建设艺术理论。”左联标志着革命文艺队伍的聚集,并意味着革命文艺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前此革命文学论争中狭隘团体主义的排他倾向。同时,左翼作家内部和左翼与新月派、第三种人等的论争中,又提出了文艺理论的系列新问题。例如,文艺自由的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民族化大众化问题,文艺与人性、阶级性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等。诸多问题的核心都涉及关于文艺本质特性的认识。这些问题的讨论,势必推进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解。

与“新月派”以梁实秋为代表的争论是围绕文学与人性、阶级性的关系问题展开的。“新月派”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认为文学是超阶级的,只表现所谓“人性”。而且认为文学是天才的产物,永远与大多数人“无缘”。这种论调自然受到左翼作家的反击。鲁迅就明确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①鲁迅否定抽象的不变的“人性”,认为人性是发展的,在阶级社会中,人性必然带有阶级性。无疑,鲁迅的观点是合乎辩证唯物史观的。

^① 鲁迅:《“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64页。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6

左翼作家与胡秋原、苏汶的论争起因于他们主张“自由人”的、非政治的“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的文学。在当时革命与反革命尖锐对立的情势下，这种文学虽非不存在，但这种企图脱离两军对垒而“自由”的文学口号，实际上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发展。它受到左翼的批评也是必然的。文学能否和应否脱离政治而自由的问题，实际就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从文学史上看，这种关系自然相当复杂。但在阶级斗争激烈的时期，文艺与政治存在紧密的关系正是合乎规律的普遍现象。

革命文学要面向大众，就需要大众接受。因此，大众化问题的提出也势所必然。当时瞿秋白、郭沫若、郑伯奇、茅盾、周扬等所探讨的“普罗大众文艺”的建设问题，从文学语言的层面提出“大众语”，意在使当时还不够通俗的和欧化的白话文更能为群众所接受。他们的主张虽曾受到“语言是上层建筑”、“语言有阶级性”的错误观点的影响。但要求白话文更多汲取群众生动活泼的丰富口语，从文学大众化的视角，又确有其必要。至于整个文学语言应在现有白话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传统文言、外来语言和民间丰富口语汲取有益的养分以丰富和发展自己，则是通过讨论后所逐步达成的共识。虽然，在当时大部分作家均与群众隔绝的情况下，大众化问题的实际解决并不可能。

避免文学的标语、口号化，重视文学应有的特性，在提倡革命文学不久即被提出。鲁迅针对其时确实存在的忽视文艺特性的倾向，指出，“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① 这使文艺特质的问题得到进一步的讨论。事实上，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文艺与现实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都涉及文艺的特质。而左联成立后所组织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书籍的翻译，如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没有地址的信》，冯雪峰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之社会的基础》、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还有瞿秋白编译的马克思主义论文集《现实》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助于人们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进一步认识文艺是通过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思想和情感并反作用于社会，因而它属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特性。而现实主义则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都一再论述的重要问题。20年代末因翻译日本左翼理论家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写实主义”和“新写实主义”，后来又引进苏联“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合会）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从而在我国文坛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观点。后来，周扬介绍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口号，包括他所概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三大特征：在现实的发展运动中认识与反映现实、创造典型

^① 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68页。

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大众的文学等，对人们更为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艺术创作方法的关系方面，起到了纠偏的有益的作用。上述翻译和引进对于我国革命文艺界更深入地推进文艺本质的更全面的认识，都有着明显的重要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左倾思想中，有一时期把小资产阶级视为“危险的敌人”。从2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实践过程中，“拉普”的左倾幼稚病和庸俗社会学的重要表现除了否定传统，要在平地上建设无产阶级的新文化外，还有对“同路人”打击的理论，即所谓“没有同路人，只有同盟者或者敌人。”他们甚至批判高尔基和马雅可夫斯基。这些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观点不仅影响到我国“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等人的批评，在与胡秋原和“第三种人”的论争中，也仍然流露出来。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张闻天便化名“歌特”，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一文，对左翼作家中的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主义进行纠偏，指出左翼不应排斥“自由人”和“第三种人”，而应团结他们，这样才能壮大革命文艺统一战线。上述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作家加入文艺统一战线的倾向，到后来中共中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后，才有更显著的纠正。因而左联存在期间，其内部的宗派之争仍然没有能够完全克服。既存在党内冯雪峰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上海后与夏衍、周扬、阳翰笙等人的矛盾，还存在周扬等与鲁迅、胡风等党外马克思主义者的矛盾。后来还引发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在当时与中央联系不畅的情况下，周扬等从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的报告启发中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与鲁迅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都从当时反对日本侵略的立场出发，精神上是一致的，后来都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左翼时期国统区的革命文艺运动与当时中央苏区的工农文艺运动，构成中国20世纪30年代新文艺发展的崭新景观。尽管当时也存在有自由主义的各种派别的文艺。但左翼文艺与国民党当局所倡导的“党治文学”和“三民主义文艺”、“民族主义文艺”相对抗，成为揭露蒋介石倒行逆施统治的匕首和投枪，鼓舞革命人民起来斗争的战鼓与号角。这时期鲁迅所写的杂文，茅盾、丁玲、张天翼、艾芜、沙汀、萧红、萧军等的小说，田汉、阳翰笙、夏衍等的戏剧、电影，中国诗歌会和臧克家、艾青等的诗歌，都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际成绩和广泛的影响。它成为当时世界范围内“红色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一部分。

左翼时期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除了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外，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文艺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许多正确的意见。鲁迅不仅在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文学中的人性与阶级性、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等问题上发表了精到的见解，他对中外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方面所阐述的“拿来主义”也很精彩！他指出“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

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

8

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①他认为，继承和采用旧形式“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又说：“这些采取，并非断片的古董的杂陈，必须熔化于新作品中……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些意见都是十分正确的。瞿秋白曾担任党的主要领导人，执行过左倾路线。1931—1933年他参加左联的领导。1932年瞿秋白编译的《现实》一书中除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外，他还写有《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恩格斯和文学上的机械论》、《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纳斯》等论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瞿秋白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首倡者之一，对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考比较深入。他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一文中指出，“革命的文艺，向着大众去”，关键是作家要“去观察、了解，经验工人和贫民的生活和斗争，真正能够同着他们一块儿感觉到另外一个新天地。”他一再提倡以现实主义来克服当时流行的“革命的浪漫蒂克”倾向和空洞浮泛的文风。尽管瞿秋白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也带有当时难免的某些左的倾向，但他的理论更有系统性和指导意义。冯雪峰从1930年到1933年担任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后参加红军长征，1936年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回上海主管文化和文艺工作。还在1928年冯雪峰发表《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就不赞同创造社、太阳社批判鲁迅和新文学的传统，认为现阶段仍是民主革命，反封建的任务尚未完成。他一直坚持认为无论革命文学，还是同路人都仍然担负“五四”以来的反封建的任务。这使他在政治上比较宽容，在对“第三种人”和“自由人”的批判中，他也提醒要注意要防止机械论和关门主义。但在实际文艺批评中，他受过“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观点的影响。其他如周扬、胡风等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方面，也都做出过不同的贡献。

三

从抗日战争爆发到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其标志性的理论成果是产生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中共中央就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实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左联解散，大批左联成员在抗战高潮中都先后奔赴前线，投身战地服务团和各种文艺演出队，以自己新的作品呼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木刻记程〉小引》，《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9页。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6卷，第19页。